

全文提要

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一个敏感性很大的问题，又是一块经验教训丰富的沃土。

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62年。此段前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做了两大工作：正面教育和对旧思想进行批判。斗争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后期则发生了过火的斗争和重点向党内转移倾向。第二阶段，1962年到1976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意识形态斗争有了新的纲领，从此以后，斗争走上错误道路，但也有正确的活动，要做出科学的评断。第三阶段，1976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斗争的发展是健康的正确的，在三个回合的斗争中没有重复过去的错误，但发生了软弱退让的倾向，导致发生动乱和暴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

四十年来，主要的经验教训可提出以下四条。(一)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用以卫护自己的阶级统治，不然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二)科学地进行斗争，核心是定准性质，基础工作是准确了解形势，斗争要避免简单化概念化。(三)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和斗争，把一切斗争都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观察，用历史的观点总结斗争。(四)培养全民族的理论思维，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理智的斗争。

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经验教训

王 宏 彬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一个敏感性很大的问题，画出它的历史曲线，可能会出现消极大于积极的轨迹，但是，这是一块经验教训的沃土，应该深耕多耘，让历史的教训变成我们的战斗智慧。

一、40年来意识形态斗争的发展轨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无产阶级处于执政地位（马克思说的“统治地位”），由于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在各个阶级间发生不同的反映，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发生分歧和斗争。其中，意识形态斗争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有时，它会超越其他斗争，带有非常尖锐的性质，甚至引来像1989年风波那样关系国家兴亡的严重后果。因而，这是一个应该十分重视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斗争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时高时低，时紧时松，一直没有停止。画出它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以下的图景。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62年。这一段时间属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初期，共产党在领导复杂的国家建设同时，注意了抓意识形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对政权的占有，也开展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工作。这样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即“灌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同时，也对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和某些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夺取被这些思想占据的领地。总的目标是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居领导地位，成为“时代的统治思想”。在进行正面教育方面，先后开展了新人生观教育、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教育、毛泽东选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学习，要求干部有计划地读十二本书，等等，这些教育虽然在后期受到林彪鼓吹的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干扰，但总的说是有成效的，扎实的，真正对人起了改造作用。经过这样教育，使人们奠定了新人生观和科学信仰的基础。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教育的成效。在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各种旧思想的斗争，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在实际工作中有对半途而废思想的批判（如王四喜思想），对

三大敌人思想如封建思想、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批判，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在社会上和人们思想中树立了新的标准，使人们从旧思想和反动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抖落了旧的思想灰尘，认清大是大非，在历史的急剧转变关头，迅速地适应了新社会，避免了过长的徘徊和社会动荡。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是成功的，有成绩的（虽然可以找出缺点和问题），共产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真理，在这个领域也得到了证实。

到1956年前后，受各方面情况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开始同政治对接起来，并且开始向党内转移。1955年发出对“小脚女人”的批判，1958年进行反右派斗争补课，同年对“反冒进”进行批判，到1959年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都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思想注解，并且斗争重点一步一步转向党内。意识形态斗争出现了政治化、扩大化、过火化的苗头，孕育着下一阶段的完全变性。

第二阶段，1962年到1976年。所以把这一阶段从1962年划起，是因为在196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做出大抓意识形态斗争的决定。这样决定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来说是一个转折，在此以后，意识形态斗争便在这个新纲领指导下，大步向错误道路滑去。不久以后，毛泽东连续发出对文艺工作的指示，进一步阐述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过头看法和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所谓“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都有值得注意的反映”，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到“文化大革命”，又升到“黑线专政”、“封资修统治”、“夺取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高度，结果意识形态斗争就完全变为政治斗争。在这样纲领的指导下，在1962年后，在学术和艺术领域的批判力度加强，温度升高，斗争驰出了常轨。1962年，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开始把斗争提到政治高度（“利用小说反党”），循着政治斗争模式发展，最后从政治斗争高度做了处理。在此以后，不到两年间，出现了学术艺术批判高潮。电影、戏剧、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弥漫着批判的战火。应该说，在这些领域进行一定的批判是无可非议的，或者说是必要的。然而，对学术艺术性问题以至思想性问题，都从政治角度观察，使它带上政治性质，以至同政治斗争合一起来，这就混乱了界限，弄错了性质，扩大了打击面，使斗争走向岔路。

这个时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也强化了意识形态问题。在1963年后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解决政治、经济、组织问题的同时，提到了“重新教育人”问题、真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问题，政治斗争同意识形态直接通联起来。到“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方面更是合而为一，意识形态斗争

成为政治斗争的先导和组成部分，最后又成为斗争的深层目标之一。在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时，艺术问题就同庐山会议及后来“翻案”直接结合起来。以后在一系列批判斗争之后，“彻底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对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的话，应该说，这个阶段的斗争整个是在错误的轨道上行进的，主要表现是混淆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以至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进行了过火的斗争，打击面扩大，打击深度超限，斗争方法失于粗暴，后果当然不好。但是历史不可能是单行线，不能只有错误没有正确，也不可能只有正确没有失误。在1962年后的十几年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有积极的东西，包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如30本原著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开展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等结合实际的学习，向群众和干部“灌输”了正确的思想；进行了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空头政治、反对形式主义、以及反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反对林彪、江青集团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常常淹没在“左”的狂热喧嚣中，但是也反映出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有党的原则在闪烁光辉，表明即使是在错误路线统治下中国也不是一团漆黑，对这段时间的历史必须作出科学的评断。

第三阶段，1976年到1989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建设的时期，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上做了大量工作，恢复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正确原则，对历次意识形态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件和人物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是共产党的郑重态度和非凡胆略的表现。然而，由于对过去错误缺乏历史的态度，在有些人那里出现了相反的错误：在社会上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共产党内出现了软弱、涣散的错误，纵容了这个思潮，发展的结果出现了1989年的动乱和暴乱。

出现在这十年历史上的首先是1978年对“凡是”观点的批判，这个批判是按照党的正确原则进行的，揭露了错误，教育了人，改变了路线，没有过火的斗争，没有扩大的打击，收到了理想的效果。随后，在1979年到1980年出现了第一个回合的斗争。1979年发生了西单墙活动，在人权、自由、民主的口号下公开宣扬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党内理论务虚会（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提出些好的意见，有积极的一面）上，有人提出了同党的原则不相符合的问题，对党和毛泽东进行了丑化。这些情况反映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新的斗争，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此，党和政府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教育和法制等多方面进行了工作，制止了一次正在发生的大混乱。应该说这次斗争的处理是成功的，既及时制止了一次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的泛滥，又在处理上选择了适当的方法，表明党已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到了教益。在此以后，在1981年到1983年间，斗争在理论领域尖锐起来。在研究马克思思想特别是早期思想的题目下，提出了人

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等观点，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并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来冲击马克思主义。这些活动所以成为问题，不在于提出这些问题，不在于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而在于用这样的分析代替党的分析，用这样的纲领代替党的纲领（现在，苏共就进行了这样的代替），并在国内外引起相当大的误解。这是党和人民所不能容许的，理所当然要进行制止。这种制止和对《苦恋》的批判，形成了这个时期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这是第二个回合。在这次斗争中，无论在批判的方法上、涉及范围上以及后来的处理上都采取了和缓的冷处理方法。虽然对精神污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审查，但主要还是通过教育方式进行的。至于在个别地方和领域发生了同斗争本身相远的举动，如对穿着方式的干涉，则很快就得到制止，不足以引为攻击党的材料。但是，这次十分必要的反精神污染斗争，在外部几股力量的夹攻和领导软弱的情况下，很快就告夭折。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形成积弊，为以后的恶性发展埋下种子。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软弱退让在这里有了集中的反映。1984年以后，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际和平演变背景和共产党某些领导人软弱的情况下发生了恶性发展，不仅公开同党和社会主义对立，而且带有复仇色彩，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步步升级。1986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学潮，实际是一次动乱。1987到1989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更加露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纲领，公开用资本主义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对抗。同时，组织工作也加快进行，各种自由化社团纷纷出现，进行串联和组合，意识形态斗争已不止于意识形态，而是在准备直接行动了。可以说斗争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时刻。在这样时刻，党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支持和纵容的政策，使党陷于无力状态，结果发生1989年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在意识形态领域软弱、退让的结果给党极国家带来和大的损失。所幸，党的马列主义原则还存在，党的坚强的领导者还存在，党的坚定的骨干力量还存在，使党能够迅速平息暴乱，终止动乱。这后半段时间的斗争证明，意识形态斗争不可轻视。不要认为意识形态斗争仅仅是不同意见的“议论纷纷”，它可能导致流血，甚至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颠覆。

对这一阶段总评一下的话，可以说，主流是健康的，因为我们党恢复了马列主义路线和正确政策，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处理得好的。但是，也出现了新倾向，即软弱、退让、投降，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进行原则坚定的斗争，这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是更大的危险。

总起来说，40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我们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正确地向“左”滑行，在纠正“左”的错误后又部分发生了向右滑行的倾向。但是，党有马列主义原则，有自我批评的武器，有勇于改正错误的胆略，因而能够在40年中不断纠正出现的错误，使斗争转到党的原则上来。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

行正确斗争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依靠这些条件继续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取得胜利。

二、从历史的学校中学习什么？

40年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情况是复杂的，经验是丰富的，付出的代价不小，但能够得到的补偿也很多。如能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我们就会学到很多东西，用丰富的斗争经验武装起来，在今后的斗争中避免重走弯路。

40年的历史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主要的可以提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卫护自己的阶级统治

近年以来，人们受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常常把“反左”放在意识形态斗争经验的首位，这有一定道理，决不容许“左”的东西在未来某个时候大规模卷上重来。但是，从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高度看，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角度看，从最近获得的新经验看，第一位的应该是保证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我们国家的统治思想，即保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用以卫护无产阶级的统治。在我们国家，在我们时代这是头等大事。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不在思想上占居统治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也是不巩固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具有巨大的瓦解作用，它既会不断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也会导致人心涣散和政权瓦解。这种危险在几年以前还是理论上的论证，现在，在中国的暴乱和东欧的激变中，已经出现了活生生的事实。过去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今天已能看到“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了。清谈误国，巷议亡魂，反动的意识形态活动是决不可低估的。正因为这样，在总结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时，第一个就要拿出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关系阶级和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年前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经常处在历史发展的焦点上。资产阶级用上百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要消灭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则“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在我国建国以后，党牢记了这一真理，在40年中一贯地注意抓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虽然，在斗争中不免出现一些错误，但维护无产阶级思想统治地位这一点则是无比正确，并一直坚持的。因此，尽管近年来有国际上的和平演变腐蚀，国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滑落，但我们国家里无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统治地位始终是巩固的。所以，这应该是我们40年中取得的第一个经验。

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要做两大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是通过宣传教育即“灌输”，提高党和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这是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一项根本

工作，因为人们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树立了马列主义信仰之后，就会产生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成为卫护无产阶级统治的战斗力量。在40年中，党始终坚持了这个工作，从一般教育到系统学习，从学习通俗教科书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群众，多方面多范围多层次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这种工作是扎实的和有效的，已经收获了果实。现在，正是这批人，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成了党的骨干和国家的中坚，成为卫护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有人“批判”和败坏了马列主义，引起了马列主义的冷淡和学习的低落，致使相当多的人对马列主义缺乏认识，不掌握马列主义原理，失去了判断事物的标准，随之思想政治觉悟也有所下降，这是1989年风波中许多人盲目卷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总结意识形态斗争教训时，不能不把“灌输”这个问题着重地提出来，以期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灌输”和提高觉悟的高潮。

坚持统治阶级思想必须树立和维护思想上的权威，用以团聚革命力量，树立革命信仰，引导群众斗争。这样权威虽然往往由个人来代表，但在无产阶级这里，这种权威不是个人的，不是小团体的，而是阶级的，党的。这种权威的出现是党和阶级成熟的反映，是阶级的旗帜。不明白这种权威的必要性，一听说树立权威就筋鼻子是对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陌生，在这样问题上不能搞幼稚病。在中国，在长年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的权威，中国赖有这样权威，才在几十年中把人民团聚在这个旗帜下，坚而不摧，百摇不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向美好的明天。打倒这样的权威，无补于无产阶级的兴旺，相反，只能危害自己。在东欧和苏联，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结果，反对者搬倒了几尊雕像，但倒霉的却是人民，甚至是他们自己。不能忽视这样教训，再蹈这样覆辙。

坚持统治阶级思想必须向反对它破坏它的敌对思想进行斗争，对各种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批判，剥夺它们的武装，夺取它们的领地。通过这样的斗争，揭露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想的实质，提高群众的认识，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在这方面不能麻木不仁，不能软弱退让，不能让出阵地，不能因恐左而隐匿自己的旗帜。当然，也要进行科学的斗争，斗争失当也会有损无产阶级形象、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第二，科学地进行斗争，保证斗争的积极结果

40年的历史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科学地进行斗争，才能保证斗争的正确方向和收得好的效果。所谓科学地斗争，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准确分析形势，准确确定斗争性质，严格区分矛盾，正确掌握政策。这样的斗争有助于分清是非，有助于避免错误，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地位的巩固。

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定准斗争性质是最核心的问题。要严格分清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性质，区分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弄清是蓄意进攻还是方法失当

或认识问题，严格划开大杠杠。有了这样的划分就能正确确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确定斗争的规模和深度，避免走上岔路。在50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到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则较多地混乱了界限，进行了不合实际的升级，离开了科学进行斗争的轨道。80年代后期，有些人又从另一方面混乱了界限，出现了退让的作法，也离开了科学地进行斗争的轨道。因此，在涉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时，首先要在定准性质上下工夫。

为了能定准性质，要更好地了解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有了对形势的准确了解，就能有准确的斗争定性，能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过去40年间，每一次斗争都有其自己的形势特点，认识不当就会做出错误判断，影响斗争全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形势认识失当，做出了党变修、国变色的判断，因而定错了斗争性质，选定了错误的打击方向和打击力度，留下了历史遗憾。

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对于斗争中的倾向不能简单化、概念化，用简单的左右或改革保守来概括。由于斗争中参与的力量、涉及的方面很多，大都内容复杂、矛盾交错，用一种倾向难以概括清楚，也会发生偏误。应该是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用简单化办法解决。这去有些斗争是预先定下一种倾向，然后按照一个方向强化斗争，结果不是方向偏转，就是在倾向变化时失去主动。“文化大革命”前，右倾被定为主要倾向，于是就一往无前地反右。结果明明已经“左”转，还要继续反右，这样就必然是越反越“左”，加重了错误的程度。80年代初期，在清除“左”倾错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结果在一部分头脑中沉淀了“反左”意识，形成了一味“反左”的思维，把斗争情况简单化了，后来在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便缺少分辨力，甚至客观上成了自由化的同路人。所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能进行公式化的战斗。而要科学地进行斗争。

第三，用马列主义态度对待历史，用历史观点对待斗争

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尖锐地提到今天的日程上。因为有许多对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不恰当看法，往往是由不正确对待历史，不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产生的。所以，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对待斗争，总结斗争，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方面，居于首位的是把斗争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观察，根据历史条件来判断斗争发生的原因、斗争反映的阶级和历史要求、参与斗争的各种力量状况，确定斗争的性质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判断的准确。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生和消失都是一定条件的产物，做为社会现象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具有这样的特性，更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在

这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条原理，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³⁾这给我们一个分析社会问题、分析意识形态斗争的极好原则。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过去的斗争，便可得到对斗争的本质的认识。例如，对于情况极为复杂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分析它发生的历史条件，看到当时国内外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背景，看到毛泽东对这种形势的过于紧张的认识，看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国内外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党内建设社会主义上路线分歧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个人品质、权力之争。这样就能把认识放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样，1989年的风波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国际上的和平演变背景，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及过去历史的错误认识，没有某些领导的软弱，就难以出现这样的风波，即使出现也会有不同于1989年的解决办法和不同的结果。因此，强化历史观点，学会根据历史条件观察历史事件，是从40年斗争中应该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对于历史，包括过去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采取历史的态度，严格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和总结，不能用发展了的认识评断尚未发展的历史，责骂过去的斗争为什么搞错无补于正确认识这些斗争，更无益于吸取经验教训。对于过去的斗争，只能是历史地进行总结，找出发生各种历史事件的条件，以及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问题和失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态度，这样做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益。在总结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时，往往出现用后一次斗争否定前一次斗争，用后一段历史否定前一段历史的现象（正确的否定是必要的）。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否定的结果是否定了党，否定了自己，这是不正确对待历史的结果。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把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个人人格化，用“整人”、“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来概括某些斗争，这样做不仅不能说明斗争真相，反而丑化了党。应该说在斗争中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在党的号召下进行斗争的，是完成党的任务，只是因为总的斗争方针或策略发生偏误，使得一些人跟着陷于错误，不能简化为“整人”。现在，这种陷党于丑化的说法应停止了。

第四，培育全民族的理论思维，保证思想清醒和理智地进行斗争

在建国以后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少场合反映出人们投入斗争时，没有对斗争的深切思考，没有对斗争性质的明确了解，轻率地投入战斗。在党领导的斗争中，是激于“党的号召”、“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的朴素理解而投入了斗争，结果在没有真正领会上级精神的状态下行动起来，或者使本来是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中走了样子，或者是使原属错误的决定加重了错误。“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教训是异常丰富的。在遇到自发的群众活动以至是错误活动时（如1989年动乱），由于缺乏分析和思考，往往被表面的现象和口号所迷惑，不分析其是否合理便轻率地投入支援，结果支援者的热心同被支援者的意图有严重的错位，不能不发出上当受骗的悔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不够，理论认识不高和对问题进行分析不够所致。这种情况反映出理论思维不强的弱点，对问题不问个为什么，不考虑是否有道理，不分析是否合乎实际，行动必然是盲目的和轻率的。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们的理论思维受到了压抑。近百年来又遭到帝国主义的欺凌，更加重了这方面的弱点。建国以后，人民参加了国家的政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但是几千年形成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所以在各种斗争中就显出了理论思维不足这样的弱点。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改变了过去的状况，已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国际中已占居重要地位，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迅速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养成从理论高度考虑问题的习惯，进行有理论指导的斗争。因此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分辨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当前一项迫切任务，应该下力量解决。一百年前恩格斯有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这个工作当然是艰巨的，也需要时间。但是，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上了，应该早日把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提高起来，去迎接未来更艰巨的斗争。

、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2） 同上第53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